

新加坡华社语言调查

徐大明摇周清海摇陈松岑摇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京大学学术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任 蒋树声

副主任 洪银兴 陈骏 张异宾(常务)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帆 王颖 叶继元

孙义燧 李成 吕建

任天石 陈骏 宋林飞

张异宾 吴培亨 柳士镇

郭子建 洪银兴 钱乘旦

龚昌德 童星 蒋树声

程崇庆 赖永海 谭仁祥

南京大学学术文库

总摇摇序

蒋树声

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是学术和人才。二千多年前的儒家典籍《大学》,就倡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中就蕴涵着昌明学术、探求真知之意。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无论是我国两汉时期的太学,还是两宋以后逐渐昌盛的书院,无论是古希腊雅典城邦的哲学学园,还是中世纪欧洲次第建立的大学,类似的学术研究,都主要集中在经国治邦的政治理念与修身养性的道德哲学领域,而且以整理、阐发经典为主。19世纪初诞生的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模式,由于更加重视科学研究,主张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相统一,由于将自然科学的研究引入高等教育的殿堂,因而使得大学的理念为之一变,高等学校的形态与功能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时至今日,高等学校,尤其是研究性大学,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理论创新、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基地,科学研究已经成为现代大学的一个重要职能。当然大

学“学术研究”的内涵，也因时而进，不断丰富、充实，由只注重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发展到注重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管理科学的探索，进而追求科学与人文的整合；由只注重基础研究，发展到兼顾理论、知识的应用与技术的开发、推广。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江泽民主席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专门论述了建设“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的重要性，指出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立志于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为国家强盛、民族复兴和人类文明演进作出更大贡献的南京大学，理所应当要承担起这样的使命与职责；而出版《南京大学学术文库》，正是我们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所作出的诸多努力之一，其现实意义与深远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出版《南京大学学术文库》，应该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倡学术创新。学术的生命、学术的价值就在于有所继承，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创新是学术昌明、理论发展的灵魂所在。此外，在学术研究上，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已成为发展趋势。

新的知识生长点、新的理论突破口，往往处于学科的边缘及交叉地带。能否突破多年来业已形成的彼此分割和疏离的学科界限，携手攻关，进行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是我们能否有所创造、有所突进的关键所在。

据我所知，欧美发达国家的堪称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性大学，大多有水平甚高、影响甚巨的学术期刊与出版机构。这些高水平的期刊与出版物，成为大学鲜明特色的标志之一。南京大学在近百年的办学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和学术风格。在

若干学科领域,南京大学不但在国内居领先地位,在国际上也接近前沿,有重要影响。《学术文库》要立足南京大学,进一步发扬我校已有的学科优势,并同时通过《学术文库》的出版,将我校正在生长发展中的新的学科影响扩展、光大,以形成南京大学新的学科优势和学术流派。对于南京大学出版社来说,能否使《南京大学学术文库》持续出版,形成特色,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较大的影响,既是对南京大学出版社的一个挑战,又是为南京大学出版社上水平、上台阶提供的一个难得机遇。

祝《南京大学学术文库》越出越好!

一九九二年 缘月于北园

前摇摇言

本书为 1957 年完稿的一份语言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是关于 1957 年在新加坡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一项语言方面的社会调查。调查研究的内容是新加坡华人的语言态度和语言使用情况。目前出版这本书，一方面考虑到该报告提供了一个大规模语言调查的详细资料，对于社会语言学和双语学的研究具有进一步的参照作用；另一方面也因为许多后续的研究已经反复引用其中的发现和结论，作为一项新加坡历史上最大范围的深入性语言调查，实在有必要公布其中比较具体的内容。

新加坡共和国于 1963 年成立。在成为主权国家之前，新加坡曾经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当代的新加坡人一般认为新加坡的现代历史是从 1819 年英国殖民官员莱佛士将新加坡开辟为自由港开始。在此之前，新加坡只是邻近马来半岛南端的一个人口稀少的荒凉海岛。因此新加坡的现代史，也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也是转口贸易发展的历史，也是人口通过不断移民而膨胀的历史；同时又是在建国之后经济高速发展，一跃而进入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档次国家的历史。新加坡的人口组成，从民族成分上来看，基本上是三大民族，华人占

七成以上,马来人将近两成,以讲泰米尔语为主体的印度族群总数接近一成。官方一般还区分以欧裔为主体的“其他种族”类项,这些人总数一般保持在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二的水平。由于历史和民族的原因,新加坡的语言情况十分复杂。新加坡独立后,政府一直采取积极干预的语言规划政策,开展语言运动,力图影响语言的社会发展方向。这样一来,本来就复杂的语言状况就进一步增加了动态的因素。自1979年开展“讲华语运动”以来,华语的普及使得原来以闽粤方言为主要交流工具的华人社会产生了更加多样化的语言状态。

“新加坡华人社区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的调查研究”项目,就是在上述背景下提出来的。该语言调查研究项目申明的目标有两个:一是全面地掌握新加坡华社的社会语言动态,二是评估以“讲华语运动”为主的语言规划行动的成果。前者的确定是在进行了初步的新加坡社会语言状况背景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后者是在推广华语运动进行了数年、进入了深入发展阶段,而社会上仍然对其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评议的情况下决定的。作为接受过社会语言学训练的科研工作者,我个人对于深入了解新加坡多语社会的复杂机制、语言规划的客观验证等也有浓厚的兴趣,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地联系了有关的理论问题。

提出上述研究项目的时候,我正在成立不久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任职,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1982年,该项目由我向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周清海教授提出,后来纳入周教授主持的“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项目中成为其中的子项目。项目初步计划的酝酿持续了较长时间,而后于1985年11月正式开始实行。作为该项目的组成部分,由我提议并负责具体联络,以周清海教授的名义邀请了北京大学陈松岑教授

来新加坡参加项目的研究工作。陈教授欣然接受了邀请,于 1987 年 10 月到达,随即投入了紧张的问卷设计、发放、调查的组织等工作。周清海教授在项目的初期组织过程、问卷调查的基本设计构想等阶段主持了几次重要的讨论,并且作为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的主任也一直给予该项目重要的支持,而且利用其个人在新加坡教育界多年的影响和关系,为问卷的试点调查和正式调查的第一阶段的问卷发放工作进行了重要的联络和组织工作。陈松岑教授也主持了项目的几个重要的实施阶段的工作,但因故于 1987 年 12 月提前结束了在南洋理工大学的工作。陈教授离开之后即由我全面负责项目的有关工作。先后参加项目具体工作的有当时在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工作或学习的一些人员,包括甘于恩、谭慧敏、陈佩玲等人。周清海教授 1987 年下半年休假离任期间,项目进入了比较艰苦的阶段,但终于在周教授返回中心以后于 1987 年 12 月正式完成结项。

下面我们就摘要介绍一下调查报告的内容。该报告分做以下八个部分:一、前言,简略介绍了该研究项目的目的、组织、实施及其主要阶段,以及报告的结构;二、资料收集,介绍了资料收集的方法,有关实施方案的设计思想,问卷调查及现场观察的具体执行过程;三、资料分析,介绍了资料分析的指导思想,采用的分析工具及其原理;四、华社语言状况的总趋势,根据调查结果对整个新加坡华人人人口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进行了定量描写;五、语言状况的社会分化,根据调查结果对于华社内部主要的社会分化条件进行了探索,指出制约语言选用和语言态度的社会因素,描述了主要的社会分化状况;六、结论,简略地进行了方法论和研究成果方面的评估性总结;七、参考书目;八、附录,包括调查问卷样本,观察记录样本等。下面对

主要章节的内容再给予进一步的介绍：

前言是一个针对新加坡华人社区的语言调查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华人人口在新加坡总人口中的比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其语言状况的复杂性使其成为多语社会研究领域中的重要理论验证场。过去的针对新加坡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基本上可以分做两个传统：一个以郭振羽等学者为代表的社会学的传统，一个以定性研究和个案研究为特征的语言学的研究。本研究汲取了前者定量研究的特点，并且结合了人类语言学的观察描写的方法论，将新加坡的语言调查从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拓展，将语言行为和语言态度的研究进一步结合了起来。

资料收集资料的收集采用了问卷调查和现场观察两种方法。问卷调查具有在大范围调查中迅速取得多方面信息的便捷性，但是具有依赖主观性信息而难以确定资料的可靠性的局限性。观察方法具有直接、具体、客观等特点，但应用起来必须要注意观察的标准化、概念化及观察结果的可概括性等问题。我们的调查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就是要相互补充、相互验证，以克服主观、片面的观察和认识，从而比较客观地了解华人社区中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及其表现模式。我们采用的结构观察法，具有形式化、概念化的特点，能够有针对性地验证问卷调查中的关键结果。对于抽样问题的讨论也紧密地结合问卷调查的目的，例如，怎样获得有代表性的样本来推算总体参数，其中，样本的社会代表性成为语言社会调查中的首要问题；因为既要取得无偏的样本来评估华社的总体状况，又要取得典型样本来分析某些总体中数量很小但影响很大的特殊群体，收集资料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和具有挑战性。此外，对于问卷内容的确定和限定，一定需要实际验证，所以试点调查成为一个必要的步骤。

资料收集的成果可以总括为下列内容：通过各级各类学校以及宗乡会馆等社会组织，并且通过进入工业园和居民区访问等形式，一共发放了猿猿猿份问卷，回收了圆苑苑份有效问卷。另外在全国缘个不同的居民点对猿源园人在公共场合的语言行为进行了观察。因此，总共远愿愿人的语言表现、语言态度的自报或观察记录材料被收入档案。

资料分析摇在进行资料分析时我们面对着在抽样设计中所面临的同样的问题，既要通过推论统计方法估算总体参数，所以需要无偏的随机样本；又要增加足够的资料来研究某些总体中比例较小的重要的社会群体和重要的社会指标。为了灵活地处理样本的代表性问题，本项目的资料分析工作主要采用了“变项规则分析法”研究工具。具体的措施为全面应用社会语言学界比较流行的猿猿猿计算机软包。因此，资料的编码、归档、管理和统计都按照猿猿猿的格式。

华社语言状况的总趋势。在获取估算华社总体情况的数据时，我们首先对问卷调查的全部资料进行了“后层化”处理以排除调查对象样本中的职业分布偏差。然后我们对问卷调查的语言选用和语言态度的内容进行了定量分析。最后，语言使用的观察记录结果也与有关问卷调查结果进行了比较，成为可靠性验证的一个方面。

新加坡华社总的语言状况，按照我们的调查结果，可以分作下面几个方面：一、除了很小一部分人（多数为老年人），新加坡华人基本上可以算作是一个使用英语和汉语的双语人口；二、但是新加坡华人的双语人口多数是不平衡的偏向汉语的双语人；三、华语是新加坡华人目前使用率最高的语言变体；四、新加坡华人当中在同一场合中使用双语的情况相当普遍；五、尽管如此，比较典型的一些正式和非正式场合都有一种最常用

语言 六、在华人人口当中具有比较明显的在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方面的不一致以致相对立的情况 ;七、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的很多方面出现社会层化的状况。下面提供比较具体的数据予以说明 :

新加坡华人人口主要使用的语言变体包括英语、华语以及几个汉语的闽粤方言(及次方言) ,但是在不同场合中都使用其中一个语言变体的情况不超过该人口的 四成。尽管绝大多数的成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掌握了英语 ,近半的新加坡华人在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活动中使用的是汉语。但是 ,也有相当数量偏向英语的以及“平衡的”双语人口 ,前者不超过 三成,后者不超过 一成。

尽管多数人为双语人 ,大约 三成的人口在一种场合只使用一种语言 ,其余的人会使用两种或更多的语言变体。调查结果中多(双)变体使用的具体情况为 :华语和方言 三成 ;英语和华语 一成 ;英语、华语、方言 一成 ;英语、方言 一成。

我们对不同语言使用域中的语言选用情况进行了统计 ,并且进一步统计了主要语言使用域(家庭、朋友、外出、工作、交易、政府)中各主要变体的使用率的平均值。利用主要变体在主要使用域的使用率的平均值 ,我们估算了华语、英语、方言的总使用率 ,结果如下 :华语 三成 ;英语 一成,方言 一成。因此我们作出了华语是使用率最高的语言变体的结论。

对于华人人口来说 ,华语也是最主要的工作语言。不同语言变体的使用率的统计包括在同一场合的单语和多语使用率 ,该计算方法显示 ,工作域华语使用率为 八成,英语为 一成,方言为 一成。高达八成的华语使用率也是这个双语社会中各个不同语言使用域中最高的语言使用率。

从单语使用率方面 ,我们可以比较公共和私人场合语言使用的情况。英语在公共场合的使用率为 三成,私人场合为

远缘;华语的两种使用率分别是猿缘和员缘;而方言为愿缘和猿缘。可以看出,方言较多在私人场合使用,英语和华语较多在公共场合使用。

尽管语言态度有大幅度的不一致情况,超过半数的被调查人还是认为华语和英语在许多方面具有同样的优点。但是在比较华语和英语在习得上的难易程度时,缘-远缘的被调查人认为华语比较容易,员-圆缘认为英语比较容易,圆-源缘认为没有难易之分。比较下列数据,可发现对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态度,员缘的被调查人认为华语比英语更有权威,猿缘认为英语更有权威,源缘认为两种语言同样有权威。对习得的难易程度的感觉反映的是对该语言的“本族语”的认同程度。因此,上述语言态度的差别可以表示,华语多数情况下是一种认同性的语言,而英语则是功利性语言。

语言使用的观察结果基本验证了问卷调查结果的可靠性。总的情况是,对英语的使用或者与问卷调查的使用率一致或者略高一些,对于方言的使用也是或者一致或者观察指标较高,对于华语的使用两类指标比较接近,互有高低。三种语言选择的使用域的平均值,问卷结果与观察结果之间的差距均在员缘以下。

下面我们进入语言使用、语言态度的社会分化和社会层化的讨论。

新加坡的教育事业具有英文教育和其他民族语言为媒介的教育两个传统,其中,华校教育曾经是民族语言源流教育中最兴旺发达的一支,一度达到挑战英文教育的规模。新加坡华人社区在向现代化社会的迈进过程中经历了英、华两个教育源流的对立和冲突。外向型、投资型经济,以及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法律和行政体制的继承都对华校出身的人士的发展造成了障碍和挫折,而对英校毕业生提供了便利。因此华人社区从教育源流上形成了

不同的社会群体。新加坡政府自1965年代以来实行的双语教育政策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弥合这个历史造成的鸿沟。显而易见，一代对英语和华语具有同等感情的年轻人已经开始成长起来了。上述语言态度的调查结果中也提供了有关的证据。但是，从整个华人人口的角度来看，“英文源流”，“华文源流”等认同方面的区别是否已经完全成为历史了呢？

本次调查的结果说明，新加坡华社中仍然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两大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的发展趋势，其根源仍然是历史上的教育源流的区分。虽然，所谓“华校生”、“英校生”只能名副其实地应用到一些年长的新加坡人身上；但是，从思想上，多数新加坡人仍然自我认同到“华文教育为主”和“英文教育为主”，认同到“双语教育”的仍然是少数。通过“变项规则分析法”，我们对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的社会条件的相关性进行了检验。检查发现，自报的“教育源流”是最有解释能力的社会因素，所有的语言选用和语言态度的不同都可以用这个因素解释，其他的因素，如性别、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住房条件等等则不能一无挂漏地解释所有的变异，而只是在某些方面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在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方面，我们的分析都发现社会分层；因此，“教育源流”的区别也可能标示着社会阶层在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多元回归分析清楚地表明英语和方言的使用呈互补性的层化分布：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倾向于多用英语，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倾向于多用方言。华语的使用出现比较复杂的情况，具有一定程度的“非层化”趋势。对语言态度的分析避免了三种选择的模糊性，问卷的问题直指英语与华语的区别。这时的对比就比较鲜明，高收入群体倾向于认为英语比较有用、亲近、易学。最低收入群体（家庭月入溢圆四圆以下）明显的趋向华语

易学的选择,而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月收入 1000-1500 元)显然表现出了中立的态度。

结论报告的结论部分总结了调查的最重要发现,也总结了一些研究方法上的收获。报告首先肯定了新加坡政府的“讲华语运动”和双语教育的政策,作为语言规划的举措,确实收到了巨大的效果。华语从四十年前日常生活中几乎无人使用的情况,变成了新加坡华人最主要的工作和生活语言,无疑是语言规划史上的一个奇迹。与此同时,报告特别指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如总体上不平衡的双语状况、语言的社会层化、教育背景的持续性影响、最年轻一代对英语的特别青睐、语言混用的发展趋势等等。

本次调查研究不仅应用了比较成熟的语言社会学的语域理论,也应用了社会心理学的言语适应理论和社会语言学的语言变异理论,在具体的操作方法上有一系列的创新。当然,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事实上报告的很多部分不仅总结经验也总结了教训,即使是正面介绍的一些内容,也往往是针对研究队伍中的一些争论和需要澄清的思想。希望这些对进行类似工作的人员能有所参考和借鉴。

“新加坡华社语言调查”的研究报告由本人执笔,但是报告的内容是署名的三位作者合作的研究成果。在撰写报告的过程中,三位研究者也相互进行了讨论,最后集体审定了报告的内容。这次出版,由我个人对报告进行了文字方面的修订,没有进行内容上的更动。

从该研究项目的启动至今已经很多年过去了。在该研究项目和研究报告的基础上产生了许多后续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与“新加坡华社语言调查”有关的论文,以及引用有关调查结果的论文,有下列种种:

